

# 位移的南方、想像的鄉愁

——張系國七〇年代小說中的故土想像\*

劉秀美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 摘要

1970年代張系國創作了系列重要作品，《棋王》、《昨日之怒》相繼於《中國時報》副刊連載，引發當時一些文學與文化重要論述。張系國長時間居處海外，卻心繫台灣，他認為自己是根植於台灣的中國人，籍貫、出生地或現在處於何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關心台灣。本文以張系國從海外回望家園的視角，觀察隱含於小說中的家國情懷。作為「擬流亡心態」下的外省第二代，台灣相對於大陸的「南方」位置，其空間意義成為張系國想望的鄉土與精神連結的座標。在以「人」為出發點的書寫中，批判因經濟快速成長而喪失人性的社會，台灣的故土想像，小鎮／南部鄉土的召喚，則為作家精神返鄉的各種可能形式之一。

關鍵詞：張系國、《昨日之怒》、《棋王》、文本空間

\* 本文初稿曾於2013年10月發表於「全球化下的南方書寫：文化場域與書寫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感謝論文講評人陳國偉教授於會議發表時之中肯建議；兩位匿名審查人之專業審查並提供利於日後延伸發展之建議。也感謝王德威教授於論文完成後所給予之修改意見。

# Displaced South and Imaginary Nostalgia:

## The Homeland Imagination in Chang Hsi-Kuo's Fiction in the 1970s

**Liu Hsiu-M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the 1970s, Chang Hsi-Kuo creat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works. *Chess* and *Yesterday's Anger* were published successively as serials in *China Times* supplement, and triggered important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Although Chang has been long residing abroad, Taiwan is always in his heart. He considers himself as a Chinese rooted in Taiwan. Origin, birthplace or where he is now is not important.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he cares about Taiwan.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national identity hidden in hi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g's homeland retrospect from abroad. As a second-generation mainlander in Taiwan with a "pseudo-exile mentality", Chang takes the regional sense of Taiwan's southern position to the mainland as a link between the motherland and his spirit. In his writing of taking 'people' as the starting point, criticism of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at the price of losing humanity, Taiwan's homeland imagination and the calling of small towns / southern homeland have become various possible forms for the writer's spiritual return.

Keywords: Chang Hsi-Kuo, *Yesterday's Anger*, *Chess*, Text Space

# 位移的南方、想像的鄉愁

## ——張系國七〇年代小說中的故土想像

### 一、前言

張系國在台灣鄉土文學巔峰期的七〇年代出版了系列重要作品<sup>1</sup>，當時兩大報副刊正是引領台灣文化走向的重要標誌，《棋王》、《昨日之怒》相繼於《中國時報》副刊連載<sup>2</sup>，引發不少文學與文化議題的討論。

1944年出生於四川重慶，1949年隨父親遷移台灣，就身分而言，被認定為外省第二代作家。陳芳明論及前世代作家時提到：

前世代作家無論是生在台灣或來自大陸，都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外省作家的深沉思考裡，都有一個回不去的鄉土。本地作家在他們的感情深處，存在著一個受苦受難的鄉土。……基本上兩種文學取向都強烈帶有流亡的意味，外省作家回不去自己的故鄉，本省作家找不到自己的故鄉。<sup>3</sup>

然而七〇年代展開蓬勃創作的張系國，作品中雖也呈現著精神漂泊與放逐文學的孤臣感，但與上文所提前世代外省作家「回不去的鄉土」感顯然有所不同，白先勇筆下遙望上海的台北人，余光中回不了家的詩人在在顯現了「回不去大陸」的孤絕，張系國筆下的人物雖然也充斥著世代的迷惘與自我質疑，卻

1 張系國創作始於六〇年代，1963年以自費出版長篇小說《皮牧師正傳》。七〇年代開始，除延續六〇年代作品發表於報紙副刊外，並出版系列重要作品，如《地》（1970）、《讓未來等一等吧》、《棋王》（1975）、《香蕉船》（1976）、《天城之旅》（1977）、《昨日之怒》（1978）、《黃河之水》（1979），至八〇年代的幾部重要著作，如《星雲組曲》（1980）、《不朽者》（1983）等。

2 《棋王》1974年8月6日、《昨日之怒》1977年10月13日開始連載於《中國時報》。

3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12），頁562。

形塑了一個心中想望的鄉土——台灣。

1966年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就讀，1970年參加胡卜凱發起的保釣運動，成為台灣政府的黑名單。1972年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張系國因為奔走營救好友受牽連，原在當時中研院院長錢思亮的擔保下回到中研院任職，卻因為受到警總的「關注」，不得不再度離台到美國，從此放棄回台任教念頭。1949年幼年時期隨家人離開故園南遷到台灣，因為兩岸政治分裂而回不去；1973年因為政治因素移居美國，成為留居異域的漂流者，七〇年代的幾樁政治事件是造成他去國他鄉的關鍵。<sup>4</sup>

張系國第一次的空間移動是被動式的，第二次的空間移動可說是半被動式。<sup>5</sup>他在懵懂未知的年紀隨著父親「南遷」台灣，綜觀中國歷史上的南徙，往往與政治動盪有關，王德威進一步解釋這種南渡「泛指任何人民或族群被迫遷離他們的家鄉，同時也指分散世界各地，及相繼而來的文化傳播與發展。」<sup>6</sup>對於祖籍江西南昌，出生於四川重慶，爾後至台灣再往美國的張而言，這樣的解釋更顯貼切他的兩次空間移動。然而「南方」是相對於「北方」不斷位移的空間與概念，南方作為文學想像，古已有之。而在屬於他的年代，作為少數以「台灣」為故鄉的外省第二代，「南方」究竟何在？是其心中遙望的鄉土還是寄託理想所在的想像國度？本論文以張系國七〇年代出版的幾部重要作品《地》、《棋王》、《香蕉船》、《昨日之怒》為探討對象，觀察其從海外回望念茲在茲家園的視角，及其文學鄉愁（imaginary nostalgia）<sup>7</sup>的想像來源。

4 張系國的妻子潘芷秋在陳運璞訪問中提到，《遊子魂組曲》出書時曾遭警總阻擾，認為其中幾篇有影射之嫌，明顯反抗國府權威，不准出版。陳運璞舊金山報導，〈作家張系國灣區與妻女團聚〉，《世界新聞網》（來源：[http://sf.worldjournal.com/view/full\\_sfnews/838893/article](http://sf.worldjournal.com/view/full_sfnews/838893/article)，2010.07.05）諸多事件造成張氏日後雖惦念台灣，卻僅能選擇一種「精神式的回歸」。

5 本文以半被動式解釋張系國的第二次空間移動，原因在於此時的張系國並非於懵懂無知的年紀踵隨前人腳步，而是在主動思考下的選擇。然而此主動思考卻又受限於當時台灣的政治氛圍，可說是「不得不然」的抉擇。

6 王德威，〈國家不幸書家幸〉，《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08），頁183。

7 王德威曾以「想像的鄉愁」（imaginary nostalgia）一詞，綜論自沈從文以降，鄉土文學逐漸顯露的美學自覺。張系國七〇年代後的書寫，或可從此角度觀察。王德威，〈南方的墮落——與誘惑——論蘇童〉，《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08），頁141-142。

## 二、世代自覺下的軸心台灣

七〇年代的台灣，政治上處於多事之秋期<sup>8</sup>，是一個瀰漫政治氛圍的特殊世代。曼海姆（Mannheim Karl）有關世代的分析，認為「世代表示一群人在整體的社會與歷史過程裡，共處於同樣的位置。所以，同一世代人的思維模式、經驗與行動，在歷史條件的限制下，會趨近相同。……共同命運的打造是世代實踐的標記。」<sup>9</sup> 根據曼海姆的理論，蕭阿勤認為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在於成長於戰後台灣相同大環境的類似經驗及國民黨遷台後的國族認同教育，對年輕世代的同化作用，因此降低省籍差異。<sup>10</sup> 然而台灣七〇年代的政治與社會變遷情況相對複雜許多，即使同一世代的人，卻也產生了實踐模式的部分差異。

國民政府遷台後，台灣社會聚合了不同的國民典型，有隨著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的異鄉人，始終回望著大陸故土；有或出生或成長於台灣的第二代放逐者，他們被告知「根」在大陸，自己無法體會上一代的離鄉境遇，卻又無法坐視，因此選擇自我放逐之路；第三類型則是較早在台灣落地生根的「本地人」。在這樣的歷史氛圍中，七〇年代的青年知識分子被視為是：「充滿了世代意識、批判上一代、要求改革、回歸現實的年輕一代，他們成為一股社會新興的力量。」<sup>11</sup> 張系國為七〇年代新生代群體的一員，對於自己的大時代「身世」，他在六〇年代一篇題為〈兩個值得自覺的問題〉一文中曾提到：

我們生長在台灣的這一代可說很不幸。既無緣以見江山之美，與過去歷史絕緣，又無辜的要負前人種下的惡果。但如何不怨天、不尤人、不悲觀、不失望的生活下去，在島國上保持天朝之民的胸襟氣度，努力不懈

8 1970年保釣運動的影響；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2年尼克森訪問北平，同年中、日斷交；1978年中、美斷交。

9 王智明，〈敘述七〇年代：離鄉、祭國、資本化〉，《文化研究》5期（2007.03），頁9-10。有關Karl Mannheim「世代」概念分析可參考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06），頁16-33。

10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頁21。

11 蕭阿勤，〈世代與時代，現實與鄉土——七〇年代的文化政治〉，《雕塑研究》8期（2012.09），頁32。

而又能坦然接受失敗，是我們當前面臨的大問題。<sup>12</sup>

這篇文章刊載於1964年，當時還在台大讀書的張系國和六〇年代大部分具有批判意識的外省籍青年一樣，埋怨、批判上一代失敗所帶給他們的負擔，本質上關懷焦點之一仍然是「中國」，一個追求「現代化」的中國。

1970年張系國參加了保釣運動，創作上出版了小說《地》，此後在小說創作及雜文中都顯現了其雖長時間居處海外，卻心繫台灣的傾向，他在七〇年代出版的《讓未來等一等吧》一書後記中提到：

我說「根植於台灣的中國人」，因為在我看來，籍貫不重要，出生地點不重要，甚至現在身在何處也不重要。祇要關心台灣，自認為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就是根植於台灣的中國人。<sup>13</sup>

他也想「從系統科學、人道主義以及傳統哲學的迷宮裡，整理出一套可行的實用哲學，做為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sup>14</sup>由此可知，張系國似乎思圖將「根」紮在台灣的土地上。事實上，他是在其世代中少數以台灣為家鄉的外省人，在七〇年代政治氛圍中「大陸來台的，十個有九個家長鼓勵兒女『明哲保身』，趕快念完出國，取得居留權或入外籍再短期回國觀光或短期『講學』。」<sup>15</sup>而這一代的許多年輕人也的確選擇了自我放逐至異鄉。

小說〈地〉<sup>16</sup>中匯集了戰後世代的三種典型人物，簡政珍認為這篇小說可視為「作者放逐母題的具象顯影」<sup>17</sup>，這樣的放逐母題指涉的不僅僅是老一代在政治因素下來到台灣的外省人，還有己身並未經歷任何流亡經驗，而是踵隨前代流亡思想的第二代。這世代無根失落感的形成，蕭阿勤認為主要緣於：「家庭中上一代的口耳相傳，以及戰後教育的國族歷史敘事。這種來自上一代

12 張系國，〈兩個值得自覺的問題〉，《孔子之死》（台北：洪範書店，1978.11），頁123。

13 張系國，〈書評書目版「後記」〉，《讓未來等一等吧》（台北：洪範書店，1987.08），頁198。

14 同註13，頁199。

15 丘宏達，〈「大學生與大學教育」座談會紀錄〉，《大學雜誌》39期（1971.03），頁7。

16 此篇小說脫稿於1967年，是張系國離開台灣將近四年創作的六篇作品之一。

17 簡政珍，《放逐詩學：台灣放逐文學初探》（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11），頁150。

與國族敘事教化的深重流亡感，可以稱之為一種『擬流亡心態』或『擬漂泊心態』。」<sup>18</sup>未親身經歷離亂的外省第二代，失落來自上一代的精神承接，同年代的本地青年其國愁家憂又源於何處呢？蕭氏在同文中認為：「本省籍年輕知識階層也不免染有的那種家國飄零、迷茫悵惘的感受……由於本省籍年輕一代更沒有上一代人流離避亂、渡海來台的實際經驗，他們的這種感受可稱之為只是『半擬流亡心態』或『半擬漂泊心態』。」被稱之為「擬流亡心態」的外省第二代或有如張系國者，以台灣為己身認同的故鄉所在。一如歷史上身為北方人，家族卻落籍南方的庾信，因此其「哀江南」便顯出了不但是地理上的認同博雜化，也是心理上及倫理上的定位游移，當「他鄉已成故鄉」，鄉愁的座標也就充滿了不確定性，是一個移動的座標。這也是張系國在自身及其創作中「不顯自明」的姿態。<sup>19</sup>

上述三種典型人物雖然經歷不同，卻共同擁有屬於那個世代的「飄零感」。〈地〉中李明的父親是從大陸來到台灣的外來者，賣了雜貨店買一塊「在台灣的地」，落地生根的意味是強烈的。小說不只一次提到「土地」與「根」的關係，李明的朋友小禹提到「地」，有所感嘆的說：「我們的根是在土地上。離開了土地，我們絕不可能生出根來。現代人的許多痛苦、失落的感覺，我覺得都是離土地太遠所致。」<sup>20</sup>進了美國一流學府讀書的小禹，卻始終認為：「要想生根，要想不致失落，一定要靠近土地……」<sup>21</sup>張系國藉由土地／根隱喻「台灣」對於三種典型人物的存在意義。然而小說的結局，李明的父親終究把土地轉讓給台灣本地人石頭仔，外來者「紮根」失敗，意味著即便這些離鄉背井的外省族群嘗試將異鄉轉為家鄉，落實回歸現實卻落空的無奈。小說結尾李明在信中提到父親的地賣掉了，甚至點出「地」是屬於本地人典型石頭仔的：「我們這種人，只配流浪和失落，不配去接近土地……」<sup>22</sup>。

選擇自我放逐的第二代，在流離的大時代中，看似遠離的「家」總能在歷

18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頁87。

19 此部分論述感謝王德威教授提供觀點上的啟發。

20 張系國，《地》（台北：洪範書店，2002.10），頁39。

21 同註20，頁53。

22 同註20，頁54。

史、社會事件的擾攘下，既疏且近的來到眼前。《昨日之怒》一書以保釣運動為書寫主軸，述說了一群處於大時代洪流中的疏離人物，釣魚台事件引發的歷史情緒與國族使命，使得「家」在何處成為許多異鄉客不得不再次面對與思索的。身處海外的新生代，「生長在髒亂的華埠，他們面對的是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他們所要爭取的是在這個社會裡發展，在這個社會裡生根的權利。」<sup>23</sup>但也有始終心繫台灣的金理和、葛日新、施平等人。施平守著待遇不高的華文報紙編輯工作，就是不願意放棄即便是包袱的中國文化，這也是他認為唯一的文化自傲。但施平等人面對的立場卻如葛日新一般，談起台灣，眼神充滿渴望，卻又僅止於在海外回望，他們各自有著「回不去」的隱情，葛日新的「太關心台灣」而回不去，施平則在「龍門主義」下回不去。<sup>24</sup>

除了外在形式上的「看似」回不去，這些「留而不歸」的海外漂泊者心靈深處也始終找不到著陸點。葛日新和陳澤雄互相說明自己的出身時，繞了一大圈仍然是連自己都不確定的答案。

「我是湖南人，可是我生在四川成都，長大在台灣，現在人卻在美國。  
你說我是那裏人？」

「我不知道。我父親是新竹人，母親是河北人。你要問我是那裏人，我也不知道。」

「你是半山」

「對，我是半山。不管我是什麼人，我喜愛台灣。……」

陳澤雄正是張系國「根植於台灣」的實踐者，相當程度的表現了張系國對於「台灣」的念慕之情。然而因為其個人的人生際遇及七〇年代台灣社會的複雜化，雖然以台灣為家鄉，但與台灣本地人「家」的意義仍然有所不同，「家」是思歸處，也是令人迷失的「想像中的故鄉」。〈地〉中李明父親「生根」的失敗，《昨日之怒》中葛日新來不及回到台灣就客死他鄉，仍然呈顯了張系國

23 張系國，《昨日之怒》（台北：洪範書店，1979.09），頁72。

24 葛日新是那個年代被政府列為「黑名單」的代表，施平則是家長以出國讀書為榮的離鄉者之一。

以台灣為家的焦慮感，然而施平最後說道：「我會回來的，我一定會回來！」甚至自許成為南部老家的「守望者」，<sup>25</sup>正是張系國對於台灣認同的落實情感表現。

總之，此時期張系國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無論是以何種理由去國他鄉，自認一身扛起文化包袱的施平，遠航走船的李明，遠赴海外求學的小禹，太過關心回不了台灣的葛日新，短期離台的陳澤雄等人，無論立場為何，卻始終以「台灣」為回望中心。然而弔詭的是，無論作者或小說中的人物，追尋的都是一種「身不在此地」的精神式回歸。是否這就是，必須離鄉才能生成的一種「既親且疏的浪漫想像魅力」<sup>26</sup>下的產物。不同的是，張系國小說中的原鄉渴望彰顯的並非「今非昔比的異鄉情調」的感嘆，而是在回望故鄉的當下，直接解剖心目中的原鄉。

### 三、再現空間下的台灣意象

國民政府南遷台灣，形成了戰後外省世代雜揉於三種空間的複雜情緒。張系國七〇年代文本中的空間敘事是游移的，在混雜著離／返的不同情境中，中國大陸空間的喪失，台灣空間的生成，美國成為再次考驗離／返的空間。交錯的空間形塑複雜的文本，無論是符碼式的地景或意象，如何連結張系國對「台灣」及「南方」的想像？是本節要探索的問題。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在政治政策導向及「暫居台灣」的心態下，台灣空間意象被「隱形化」，遠離家鄉的大陸人始終認同台灣的暫居性，一開始並未懷疑自己回不去。

戰後國民政府「暫住」台灣的政策導致台灣空間象徵意義的匱乏。在鄉土文學蔚為潮流之前，國民黨構想宣導的國族空間與文藝政策裡並沒有將台灣形塑成為主要的象徵性符號，……寫實主義文學裡刻畫的空間座標大部分強調在大陸的風土，「神州」、「江南」、「大漠」或「塞

25 同註23，頁294、288。

26 王德威，〈南方的墮落——與誘惑——論蘇童〉，《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142。

北」等模糊的區域指涉反而成為戰後二十年間台灣文學裡常見的文化符碼。<sup>27</sup>

此種現象大約從戰後的二十年延續至六〇年代的台灣社會。前文提過六〇年代張系國和當代大部分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關懷的仍然是一個「追求現代性的中國」，雖然他們不似前世代的外省人，文化空間始終圍繞著大陸原鄉。但來自上一代的精神傳承，在所謂的「擬流亡心態」或「擬漂泊心態」下，一開始仍然無法擺脫大陸作為象徵性符碼的國族魅影。

張系國六〇年代中期第一次離開台灣，當時深受西方影響的重要刊物《自由中國》及《文星》，對當代具公共關懷及政治改革意識的知識分子意義非凡。當時，台灣鄉土文學的醞釀也已開始，王禎和、黃春明等鄉土作家的早期作品即成形於此時，此一時期的鄉土文學屬於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論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sup>28</sup>是一種經驗與感知的呈現，無明顯的批判意識，但誠如范銘如的分析：

早期鄉土小說的地方感幾乎都是藉由一些細微的家禽家畜，家人與鄰里間的互動，建構出一種親切或崩解的家鄉感受。在這些作品裡，鄉里雖然平淡，沒有特殊的雄偉建築或可當作意象的景物卻有豐富平常生活讓我們記憶……。<sup>29</sup>

27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9），頁170。

28 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論（*Trialectics of Spatiality*）將空間性的形成分成：1.空間實踐包括了生產和再生產。對應於每個社會形構的特殊地方和整體空間，空間實踐確保了一定凝聚力下的連續性。這種凝聚力蘊含了社會空間中，以及某個社會的每位成員與空間的關係裡，特定能力（*competence*）和特定的實作（*performance*）。空間再現緊緊於生產關係和這些關係所施加的「秩序」，從而緊緊於知識、符號、符碼，以及「正面」（*frontal*）關係。再現空間具現了複雜的象徵作用（有編碼或無編碼），連繫上社會生活的隱密面或底面，也扣連了藝術，而藝術最終可能比較不會被界定為空間符碼，而是再現空間的符碼。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p.33. 參見王志弘，〈多重的辯證：列斐伏爾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演繹與引伸〉，《地理學報》55期（2009 .04），頁1-24。哈維將列斐伏爾的三分法詮釋為：物質空間（朝向物理接觸和感官開放的經驗空間和感知空間）；空間再現（構想和再現出來的空間）；以及再現空間（納入我們每天生活方式的感官、想像、情感和意義的生活空間）。Harvey D.,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06), pp.129-130.

29 同註27，頁165。

六〇年代鄉土文學以人為中心所形成的地方感、社會公共關懷意識及去國後回望台灣의故土情緒，都可能是張系國台灣意識生成的重要關鍵。

諾柏格·斯卡爾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將人類生存空間的基本構成要素分成場所（place）、路徑（path）、範域（domain）：「當場所和四周互動時，就產生了內部和外部的問題。……只有當一個人界定出何者內部何者是外部時，我們才真能說他『住居』了。」<sup>30</sup>以此觀看張系國一代的大陸人，無論大陸或台灣的空間都不曾是「場所」，似乎也沒有在連結兩地的「路徑」中，形構出特殊的「範域」，因此不知鄉土何在？<sup>31</sup>從大陸到台灣、台灣到美國，飄零者對於何者為內？何者為外？似乎是迷茫的，因此不斷的自我質疑「我到底是哪裡人？」，如果「籍貫」是父祖輩諄諄教誨的存在，出生地是此生緣慳一面的處所，「南都」無法確定是偏安的「歇腳處」<sup>32</sup>還是永恆的「場所」，「哪裡人？」也只能是永遠的提問。

六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空間座標的模糊化，正契合張系國這一代知識分子需選擇以段義孚的「人本中心論」<sup>33</sup>為鄉土認知依據的所在，前世代外省籍念茲在茲的長江、黃河等大中國地景必須消解。〈亞布羅諾威〉中的「亞布羅諾威」是位於外興安嶺西北的一座山，來自大陸的地理老師直接告訴學生：「地名是人加上去的，一個人為的符號而已。讓我們直接看著那些山，那些河流吧。」<sup>34</sup>當固定的地理環境也只是人為的符號，「神州」、「江南」、「大漠」或「塞北」等地景自然可以消解，也可以轉移。這些自然地理或空間座標被以「人」為主的鄉土情懷取代後，張系國如何尋求一個心目中的鄉土？〈亞布羅諾威〉一文的開頭，引了一段馬丁路德參加窩姆斯大公會議同僚僧侶的贈

30 諾柏格·斯卡爾茲著，王淳隆譯，《實存、空間、建築》（台北：台隆書店，1984.06），頁24-25。

31 所謂場所，一般或譯為地方，即是能夠讓其居民產生內外互動與分際的所在。通過經驗與記憶，個體的身分認同與地方空間獲得一致，建構起隸屬於當地的主體意識（想像），以茲區隔外地客。這樣的範域，不管是城市或鄉間，只要是夠大並足以維持人們的生活，就是鄉土。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頁156。

32 1946年秋臺靜農移居台灣，任教國立台灣大學。他原先計畫僅在台灣做短暫停留，因此稱居所為「歇腳處」。王德威，《現代抒情傳統四論》，頁187。

33 人本中心空間之運動如同人類自己的運動。Yin-Fu Tuan著，潘成桂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03），頁143-144。

34 張系國，〈亞布羅諾威〉，《地》，頁57。

語：「小和尚，小和尚，你還有長長一段路要走哪！」<sup>35</sup> 這長長的一段路，正是眼看著前一代紮根失敗的新世代，在追尋鄉土認同的過程中必須面對的。

土地是根的代表，是穩定的象徵，紮根才能擁有穩定的「居住感」，張系國筆下自我放逐的一代，始終追尋著毫無答案的問題，既無法視異鄉為家鄉的「落地生根」，卻又「回不去」，異鄉成為擺盪於離／返間的矛盾空間。

放逐者最禁不起存在的探問，因為一旦時空錯失存有即岌岌可危。在陌生的新時空裡，所謂「他者」的世界和自我切離。主觀上，放逐者難以融入他者，而使外在世界變成自我的生活情境。<sup>36</sup>

《昨日之怒》中的施平連一張購物卡都不願申請，「他不願有一絲一毫的安定生根的感覺。他每天都要提醒自己，這不是自己的國家……。」<sup>37</sup> 然而這一代的去國者，面臨的存在困境是意識與行為的背離，意識上「愛家愛土」，行為上卻滯而不歸。如葛日新的矛盾在自我探問中顯露無遺：「他不願意在美國找事。也許他應該回台灣去？畢竟那是他生長的地方。可是他還能夠適應國內的環境嗎？……他愛那片土地，他無時無刻不夢想回去。祇有在那片土地上，他能一展所長，他才能問心無愧的生活。」<sup>38</sup>

異鄉客除了類似葛日新與施平等在「為何離開？」「回？不回？」的矛盾下成為頻頻自我質疑的一群，「故國的意象一再提醒自我揮之不去的疑問：假如我愛那片土地，我為什麼要離開？假如我想念那片土地，我為什麼不回去？」<sup>39</sup> 外，因不同原因留在美國的漂流者，在張系國筆下卻成為永遠回不了家的異鄉魂。〈香蕉船〉中落海而死的非法偷渡客；〈紅孩兒〉中不知所終的台灣留學生高強；思歸最終卻客死美國的葛日新等人，張系國以「魂斷」或「不知所終」暗喻著美國最終並未成為這些異鄉客的「場所」（地方）。

35 張系國，《地》，頁55。

36 簡政珍，《放逐詩學：台灣放逐文學初探》，頁148。

37 張系國，《昨日之怒》，頁124。

38 張系國，《昨日之怒》，頁172-173。

39 簡政珍，《放逐詩學：台灣放逐文學初探》，頁148。

1966年離開台灣到美國的張系國，1970年將近四年時間在美國創作的六篇小說收於《地》一書出版，他在書後記寫到：

離開台灣將近四年了，一共祇寫了這六篇小說，卻越寫越迷惘。在這灰暗的世界裏不論做甚麼都是灰暗的，寫小說也不能例外吧？

孔拉德曾說過，小說的功用是「使人們看見」。至於看見的世界是美是醜，卻並非小說的作者所能左右。<sup>40</sup>

六〇年代前往美國求學，當他踏上美國國土，作為外省第二代的擬流亡心態，在漂流異域的過程中顯然「深刻」起來，因而小說越寫越迷惘，然而迷惘的恐怕是作者自身的游移身分。被台灣視為黑名單的葛日新、一心一意想要歸國的施平，在某種面向上其實是作者的化身。而這些「漂泊」或者說「流亡」至美國的異鄉人（大陸？台灣？客），美國土地的空間想像對他們而言顯得百味雜陳。

台灣不但是張系國創作的原鄉也是創作的「原型」，他曾說過：「我夢寐所思的，便是那片土地。每時每刻，我每一個細胞都呼喚著要回去」<sup>41</sup>從兩件事可以見出其心繫台灣的程度。現實生活中，他在台北購置一間小套房作為居所，每年回台灣幾次，覺得是「回家」。創作上，作品聚焦於台灣，反映時代與社會。七〇年代國際冷戰時期進入尾聲，幾件政治事件凸顯了台灣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劣勢情勢，台灣政治所受到的衝擊，激發了青年知識分子延續自六〇年代的社會熱情，<sup>42</sup>進一步啟發了家國認同感。台灣經濟快速發展，逐漸邁向工業化、商業化的結果使得「人民趨向『非人格』關係的『普遍主義』，注

40 張系國，〈後記〉，《地》，頁199。

41 姚嘉為，〈心繫台灣遊子魂……文學電腦兩棲的張系國〉，《在寫作中還鄉》（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11.10），頁189。

42 1968年元月創刊出版的《大學雜誌》，事實上正延續《自由中國》與《文星》深受西方影響的政治改革與文化改革期望，同時更充分展現具有公共關懷與改革意識的戰後世代知識階層以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使命自期，並追求西方政治與文化理念實踐的熱情。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頁93。

重數量和經濟『利益』，貶低存在本質和『立義』。」<sup>43</sup> 農村人口移向都市，人民生活現代化、人際疏離化。

《棋王》是張系國七〇年代創作的一部重要作品，內容呈顯了台灣社會經濟起飛的脈動和社會景觀，一個充滿「負面」的台北景觀。故鄉在工業文明的侵蝕下已然墜入人性黑暗處的深淵，這樣的台北都會區對於張系國而言，顯得既親近又疏離，如果說他始終圍繞著以台灣為中心的書寫，類同於中國二十世紀以來鄉土敘事中所謂的「原鄉的誘惑其實源自於離鄉或無鄉的惶恐」<sup>44</sup>，也是鄉愁的始源之一。張的鄉愁感則進一步的揮起了解剖刀，從負面的批判中「愛」他心中的台灣。如余光中所言：「我不認為張系國小說的世界是灰暗的，因為他仍然心存批評，而批評就意味著不放棄希望。只有虛無主義那種官能的走馬燈，才是灰暗的。」<sup>45</sup>

《棋王》中的人物圍繞著七〇年代經濟環境轉變下的「台北人」，白先勇筆下「舊時王謝堂前燕」懷舊的台北人早已遠離，小說中有著是金錢掛帥下的知識分子形象，無論是藝術家、教授都沉淪於金錢慾望，甚至將知識分子眼中原是無價的自由與金錢等量齊觀，「我只要賺錢，錢就是自由」<sup>46</sup>。「下棋神童」成為眾生私慾追求下的一顆「棋子」，小說最後神童失常，隱喻了追求理想國度的幻滅，但張系國終究是愛台灣的，喪失天賦的神童在比賽中贏了，且是靠自己的力量贏得比賽，沒有依照原先設定棋譜下棋的神童，篤定的說：「我自己會下。」<sup>47</sup>張系國的批判並不是一種啟蒙式的「看客」式批判，而是以充滿著浪漫情懷的眼眸自海外回望台灣，希望與眷顧之情躍然於紙筆。

《棋王》在批判下輕描淡寫一個大時代的座標，然而台灣地處亞熱帶的「南方性」氣候、卻成為小說中隱含去國他鄉者的精神地標，亞布羅諾威是否必須轉化成阿里山、玉山；長江、黃河是否為濁水溪、淡水河等地景取代

43 許達然，〈六〇～七〇年代台灣社會和文學〉，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苦悶與象徵：六〇、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與社會》（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05），頁15。

44 王德威，《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140。

45 余光中，〈天機欲戲話棋王〉，張系國，《棋王》（台北：洪範書店，2011.09），頁5。

46 張系國，《棋王》，頁138。

47 同註46，頁201。

已經不重要。「溫度感」成為想像家鄉的路徑，小說中不只一次指出天氣的「熱」，因為「熱」而引出「冷氣」在台灣經濟快速成長下的「快速登場」。1973年離開自此不曾長住台灣的張系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亞熱帶氣候的溫度感都成為書寫台灣的象徵，也是作家精神返鄉的指引。

然而，張系國對於立足於土地的「地方」<sup>48</sup>另有想像，《昨日之怒》中的施平回台灣後到了一趟南部老家，儘管人事已非，他仍然想永遠做一個「守望者」。

就好像燈塔的守望者一樣，我願意永遠守望著我的老家。我講我的老家，妳也許會笑話我。老家的房子早已拆掉了，我在那小鎮總共也不過住了八年。可是我仍然認為那地方是我的老家。……住在裡面的人我都不認得，他們也不認得我，……我又有什麼權利認為那是我的老家呢？但我仍然愛那個地方，我仍然愛那些人……至少我有權利做一個守望者。」<sup>49</sup>

〈地〉中的李明走遍世界美麗的城邦和港灣，眷念的仍然是屬於他的小鎮：

我還是懷念我那個小鎮，以及鎮上那些人。妳知道，那個小鎮實在很平凡，也說不上有甚麼美麗。我認識的那些人也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哪兒都可以見著的。但是我仍舊渴望著回去。<sup>50</sup>

平凡的鄉土雖然是張系國心中想望的，他透過小說批判工業社會所帶來的人際疏離與價值觀的蛻變，甚至試圖在其中尋找一個可能的「安居」處。然而，南部老家／小鎮；北部／城市同處於當代的台灣空間，正如《黃河之水》中的詹樹仁的心境：「不能確定他是否喜歡這個城市，他甚至對它有一種莫名的恐

48 范銘如指出，無論從諾柏格·斯卡爾茲或是段義孚的研究，地方都是人類移動的停頓點，而且可以使停頓該處的人產生親切感和凝聚感。這點停頓的地點滿足生物性的需求，也會變成感情價值的核​​心。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頁161。

49 張系國，《昨日之怒》，頁288。

50 張系國，《地》，頁14。

懼，但他逐漸發覺他無法擺脫這城。他絕不可能像喜愛小鎮一樣的去喜歡這城的一切，它有太多的罪惡，但是……它也有它的魅力。」<sup>51</sup>張系國將台灣視為自我追尋的「場所」（地方），台灣空間的生成就在生活與創作上實踐，無論是美的或醜的。五歲來到台灣，南方／台灣對他而言不是「偏安之所」也不是「歇腳處」，而是鄉土的所在。於是，當工業化的台北都會區無法承載對原鄉的浪漫想像，南方便不斷的位移，即便那不是張系國原本熟悉的土地，卻是織夢的所在。因此小鎮、南部故鄉也成了異鄉客想像的回歸處，但他也明白的點出無法自絕於現代化的都會。

#### 四、結語

張系國七〇年代書寫中「南方」並非以座標式的地理位置呈現，南方為流離者以台灣為中心的家園、國土及政治歸所的想像空間。過去南渡所強調的空間移動與遺民意識已經被「擱置」，如陳寅恪感嘆「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sup>52</sup>的心態已經成為前世代擬思落土生根的設想緣由。張系國小說中具流亡心態的第一代在複雜的政治情緒與思歸不得的歷史情境中，既無法像臺靜農這樣的知識分子，在抑鬱難解的亞熱帶雜陳情結中以筆墨抒發寄託，<sup>53</sup>只得選擇透過「土地」建立「根」的所在，結局卻是「尋根不得」、「紮根失敗」。

作為南遷第二代的張系國，正逢1970年代在台灣文學史上被視為鄉土文學時期，這段期間的台灣意識形成也包括了外省作家在內。<sup>54</sup>作為外省籍作家的張系國自大陸重慶游移至台灣，最後定居美國，但他始終視台灣為家鄉。作為跨越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覺醒的一代，政治上「回歸現實」，文化上「回歸鄉土」<sup>55</sup>，鄉土對他而言喻指的是這個世代成長的台灣。

51 張系國，《黃河之水》（台北：洪範書店，2004.04），頁96。

52 陳寅恪，〈蒙自南湖〉《詩集：附唐荅詩序》（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24。

53 相關論述可參考王德威〈國家不幸書家幸〉一文，見《現代抒情傳統四論》，頁150-201。

54 陳芳明述及省政文藝叢書的撰寫時，認為由於外省作家也受到邀請，有意無意間，他們的文學思考也會呈現台灣意象。參考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頁564。

55 相關論述可參考蕭阿勤，〈世代與時代，現實與鄉土——七〇年代的文化政治〉，《雕塑研究》8期，頁33。

六〇年代早期張系國在〈兩個值得自覺的問題〉一文中尚以「在島國上保持天朝之民的胸襟氣度」期許，和大多數的外省第二代移民一樣，與父執輩一代的江山、歷史疏離，那是他們無法體會也無法書寫的「祖國」，但祖國魂始終如影隨行在這一代人身上。固然世代無法切割歷史的延續性，世代的浮現的確也如李丁讚所言：「世代意識是一個緩慢的浮現過程」<sup>56</sup>，但從前述探論可以發現，七〇年代知識分子的「世代自覺」的確無法切割六〇年代在台灣尋找「中國性」的一面，但卻也是在這樣的文化自覺下，逐漸揚棄流亡與漂泊心態，在回歸現實與回歸鄉土的認知下，向本土化（台灣化）轉向。六〇年代中期，離開台灣前往美國的張系國，自海外回望台灣，深化了對台灣本土認同的國族情緒，就像《昨日之怒》中的金理和所說：「不出來，不會知道崇洋的可怕。不出來，也不會知道中國的可愛。」<sup>57</sup>。此部分或可作為張系國將台灣視為國族情懷依歸所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為「擬流亡心態」下的外省第二代，張系國經歷了中國大陸、台灣及美國三個空間的移動。五歲離開中國不曾返鄉尋根，對所謂的「大陸原鄉」並無深刻印象，祖籍所在的江西及出生地重慶都是上一代口述下的「存在」，此空間對他而言並非一個經驗空間。被問及是否回鄉尋根？他的答案是：「我沒回過家鄉，回不回去無所謂。」<sup>58</sup>顯然的，中國空間對他而言是無意義的。因此，戰後初期台灣社會或前世代外省籍始終圍繞著的空間文化符碼已然消逝，大陸成為一個喪失的空間與不必存在的記憶。

當「神州」、「江南」、「大漠」或「塞北」不再是形塑「鄉土」的依據，美國本為「擬流亡心態」一代因無法承擔上一代的放逐悲情，選擇自我放逐的「暫居住」，是無法立足的土地，正如〈地〉中的李明雖然選擇逃離，但在遠離的過程中「家」的意象反而浮顯，「那些美麗的城邦和海港，我總覺得不是屬於我的，我不能夠在那兒安身立命。只有我的那個小鎮，即使它很

56 李丁讚，〈世代如何浮現：評蕭阿勤著《回歸現實》〉，《台灣社會學刊》42期（2009.06），頁194。

57 張系國，《昨日之怒》，頁36。此處的中國所指呼應的是張系國一再強調的根植於台灣的中國人。

58 姚嘉為，〈心繫台灣遊子魂……文學電腦兩棲的張系國〉，《在寫作中還鄉》，頁190。

平凡，卻是屬於我的一塊地方。」<sup>59</sup> 正因為「離鄉」所以思圖「返鄉」，「鄉土」的意象反而明確起來。

張系國1973年因政治敏感事件再度離開台灣，他曾提過，如果時光倒流，1972年返台後可能就不會再離開了。他對台灣的繫念由其自述可知：「如果我不能經常接觸我成長的這片土地，呼吸到自己國家的空氣，我便喪失了我寫作力量的唯一泉源，我的存在亦完全沒有意義。」<sup>60</sup> 然而他畢竟無法立足於台灣的土地。雖然生於斯，長於斯，卻無法居於斯。七〇年代的張系國正是心態上既無法在美國土地「落地紮根，」卻又「回不去」的異鄉客。事實上，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雙重無可返歸。因此，選擇以寫作追尋心目中的原鄉，他以「人」為出發點，批判人性遭致扭曲的台北都會，以台灣的自然溫度感連結他的故土想像，以小鎮、南部鄉土召喚潛藏於心中的「想像中的場所」。此處南方是不斷移動的空間，相對於台北的南方新竹小鎮是李明的鄉愁來源，此南方之南的台灣南部小鎮則是施平的尋根歸處。南方的地理座標是多麼的不明確，但在鄉愁想像的結構中又是多麼堅實地存在。於是，無論美醜，其實都只是一種「空間游離」下的想像鄉愁，作家成就的是一種心理上與倫理上的精神返鄉之路或者說「紙上故鄉」<sup>61</sup> 的存在。這種以「身不在此」的姿態想像原鄉的各種可能，是一種「身心分離式」的精神返鄉，或許也是一種「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sup>62</sup> 的心境。

59 張系國，《地》，頁14。

60 姚嘉為，《在寫作中還鄉》，頁190。

61 王德威，《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136。

62 北宋·蘇軾，〈定風波〉。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王德威，《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08）。
- ，《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08）。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苦悶與象徵：六〇、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與社會》（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05）。
- 姚嘉為，《在寫作中還鄉》（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11.10）。
-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9）。
- 張系國，《孔子之死》（台北：洪範書店，1978.11）。
- ，《昨日之怒》（台北：洪範書店，1979.09）。
- ，《讓未來等一等吧》（台北：洪範書店，1987.08）。
- ，《黃河之水》（台北：洪範書店，2004.04）。
- ，《棋王》（台北：洪範書店，2011.09）。
- ，《地》（台北：洪範書店，2002.10）。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12）。
- 陳寅恪，〈蒙自南湖〉《詩集：附唐荂詩序》（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1）。
-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06）。
- 諾柏格·斯卡爾茲著、王淳隆譯，《實存、空間、建築》（台北：台隆書店，1984.06）。
- 簡政珍，《放逐詩學：台灣放逐文學初探》（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11）。
- Yin-Fu Tuan著，潘成桂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03）。

### 二、期刊論文

- 王志弘，〈多重的辯證：列斐伏爾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演繹與引伸〉，《地理學報》55期（2009.04），頁1-24。
- 王智明，〈敘述七〇年代：離鄉、祭國、資本化〉，《文化研究》5期（2007.03），

頁7-48。

丘宏達，〈「大學生與大學教育」座談會紀錄〉，《大學雜誌》39期（1971.03），頁9。

李丁讚，〈世代如何浮現：評蕭阿勤著《回歸現實》〉，《台灣社會學刊》42期（2009.06），頁189-198。

蕭阿勤，〈世代與時代，現實與鄉土——七〇年代的文化政治〉，《雕塑研究》8期（2012.09），頁20-40。

### 三、電子媒體

陳運璞舊金山報導，〈作家張系國灣區與妻女團聚〉，《世界新聞網》（來源：[http://sf.worldjournal.com/view/full\\_sfnews/838893/article](http://sf.worldjournal.com/view/full_sfnews/838893/article)，2010.07.05）。

